

中日关系五十年 大事记

1932-1982

【第一卷】

1932—1937

张篷舟/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日关系五十年 大事记 1932-1982

【第一卷】
1932—1937

张逢舟/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张篷舟 (1904.3.3—1991.5.8)

原名张映璧，早年从事文学、新闻、摄影和教育工作，大革命时期投笔从戎，参加东征。1934年起就职《大公报》，抗战期间出生入死深入前线，写过52篇上海战场报道及拍摄大量照片，真实反映了上海将士浴血抗日事迹，并以“杨纪”为笔名写出《上海之战》、《沪战实录》等书，名噪一时。1939年采访华南六省，写出《南战场之旅》一书。40年代主编《中国大势》、《中国要览》等书。解放后，其主编的《人民手册》一书为当时颇具影响的工具书。离休后，协助王芸生老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迄芸老逝世已成七卷，所余第八卷由张篷舟续编。其毕生研究唐代女诗人薛涛，生前系薛涛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第一至第三卷编例

一、本书继王芸生先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之后，沿用大事记及附录体裁，备载 1932 年至 1982 年间之中、日有关大事，及附录重要文献，按年分五卷编印，供研究中、日近现代关系史之参考。此为前三卷（1932 年至 1945 年）。

二、大事记为编年体，每事系于年月日之下，同日发生之事，则另行起排。间有日期不详者，则系于本月之末。全书看似分散，细以绎之，各事皆脉络可寻。其中有需注释者，用（）夹注，或附于条末。凡（）内文字，皆为编者所加，并非原文，亦不加“编者注”、“编者按”字样。每卷大事记所引重要文献及专名，初见者用全称，有简称者，并注简称，以后用简称，如“国联”（国际联合会、国际联盟）。

三、人名用习见者，如蒋介石、汪精卫，不称蒋中正、汪兆铭，但在文献中则仍旧。所有资料中之日本人，原多用姓，现能查到名字者，则用全称，仍有查不到者，亦只得仍旧。

四、省、县地名均按当时行政区划，可简称者如南京称“京”，上海称“沪”，北平称“平”，天津称“津”，辽宁省称“辽”，黑龙江省称“黑”，吉林省称“吉”，热河省称“热”，察哈尔省称“察”，绥远省称“绥”等；有另称者如广州称“穗”，重庆称“渝”，河北省称“冀”，山西省称“晋”，山东省称“鲁”，河南省称“豫”，安徽省称“皖”，江西省称“赣”，福建省称“闽”，广州省称“粤”，广西省称“桂”，云南省称“滇”，贵州省称“黔”，湖北省称“鄂”，湖南省称“湘”等是。视行文方便，迳两用之。县、市以下重要地名，每卷初见者已尽可能加夹注，说明其形势、位置。地名有俗称者，如“卢沟桥”误以为“芦沟桥”，大事记中概为改正，文献中则仍旧。

五、本部另有四事特需说明者。一为自 1931 年 9 月至 1945 年 8 月，东北、华北地区在日军不断蓄意侵占下，曾沦为敌占区。敌占期

间行政区划及行政机构体制，皆有变易，为存真起见特在称号前附一“伪满”或“满”，或加引号以资区别。地名变更者如新京（长春）、省名分为辽东、辽西（辽宁）、松江（黑龙江分出）等，机构如“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是，供历史参考用也；二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成为全民抗日战争，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均以“国民政府”、“我外交部”、“我方”、“我军”等注明之，以对称“日政府”、“日外交部”、“日方”、“日军”等；1945年8月15日以后，日军投降、伪军覆灭，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始分“国军”（国民党军）、“共军”（共产党军），以示各有去向；三为1940年3月，汉奸汪精卫成立伪政权，其甘心附逆者实不过一小撮人，势力亦不过苏、浙、皖等一隅之地，但其种种罪恶活动，阴谋谬传，资料则甚难获得，现经择要著录，此乃历史罪证，请勿误为替汉奸张目也；四为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战争后期，日军屡次抽调侵华兵力，送至太平洋充当炮灰，并在东南亚残害华侨。南洋一地原是华侨长期聚居之地，所可惜哉，日军侵占后对当地华侨所加之压迫与剥削，资料极其罕见，实是本书之缺憾。其他，轴心三国（德、意、日）对盟国之战，本书亦择要记载，以观历史之全貌。

六、本书引用书报杂志资料甚多，互相参证，备极烦琐，故不一一注明出处，亦不列举引用书目。各年内容详细似有不同，亦限于资料来源所致，虽则难于整齐，似可聊胜于无。

七、此五卷在张篷舟主持下编成，陆续参加编写者有祝立明、周文熙、徐露放、胡文德、张廷凯、汪德福、袁海余、倪进云诸同志。原书问世后，即告售罄。此次得以重印出版，首承美国休斯敦华侨大力资助，又经周文熙、袁海余、李增春、张正刚、刘向宏诸同志复审订正，更蒙文化艺术出版社设法改版重印，始告完成，对此均特志谢意。

本书副主编、原人民出版社编审 周文熙

2006年8月

序一

——写在《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出版之前

不久前，老友李增春先生不无兴奋地告诉我：张篷舟等几位老先生编著的《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经过重新修订就要出版了。我感到十分高兴。承载了几位老先生多年心血的《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从酝酿到现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曲折过程，人们看到这部著作，几乎都会想起王芸生先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确实，无论是两部书的编写者还是其内容本身，都有相当密切的无法割断的内在联系。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王芸生先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这部被认为是中国 20 世纪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中日关系的名作，曾被许多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置于案头，作为重要的工具书而使用。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在老同事张篷舟等人的协助下对原书着手进行修订，中间几经波折，直到 80 年代初才修订完毕，并将原书未及写完的 1920 年至 1931 年部分，以编年体大事记的形式予以补足，从原来的七卷扩充为八卷。由于王芸生先生于 1980 年过世，他的老同事张篷舟等先生为这部书的最后完成做了大量工作。此后，张篷舟先生等人又开始编写《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原名《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 1932—1982》，计划出版九卷，约 250 万字），但是这部书只出版了五卷，时间是到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战后的部分人们始终没有能够看到。而这一次，人们终于能够一睹该书的全貌了。

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了解历史，历史资料的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人们常用“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来形容缺乏资料的研究。而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编辑，也有许多不同的方式。王芸生先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一部集史料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史论专著，与单纯“述而不作”的资料集不同。这是因为编著的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明耻”和“教

战”是社会最关注的话题。所以，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登载一段，并在文前强调意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当时，关于中日关系方面的史料出版的极少，大量的资料还没有被披露，一般读者对于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了解不多，特别是对于日本近代以来向亚洲的扩张活动知之甚少。因此，以“不至太对不起我的国家”的拳拳报国之心成就的学术成果，对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瞻念前途，焦忧如焚”的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提供了鲁迅所说的“投枪与匕首”。据说，许多人在读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后，始将数十年中日两国间重要史实了然于胸，在了解历史的过程中，慨然生发救国雪耻之心，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之中。

张篷舟先生等人编写《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开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之后。作为王芸生先生的同事和助手，这一工作无疑是对王芸生先生的事业的继承。编者依然以史家的视角，从尘封的史料中悉心爬梳，进一步将抗日战争开始后的两国关系与战后的两国关系联结起来，寻找从中日两国交恶到结束战争局面走向和平与发展的必由之路的因素。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与王芸生先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相比，《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还有不同的性质。如果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主要目的是披露重大事件的真相，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的话，那么，《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向人们提供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引起人们对中日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更深入的思考。之所以这样说，是与战后，特别是当代国际社会的特点分不开的。

人们常用“知识爆炸”这一形象的语言说明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的确，战后六十年来人们获取历史资料的手段与渠道，掌握历史资料的深度与广度，与战前相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也许在资料的公布与披露方面不能产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问世后那样的轰动效应，但是，这部书的特点是从时间上跨越了1932年到1982年的五十年，也就是战争与战后的不同的历史时段，即中日两国关系从兵戎相见到邦交正常化的转折时期。邓小平同志曾告诉我们要理性地看待中日关系

和两国历史，他希望我们既要读一部战争史，也要读一部友好史。读战争史，是为了坚持以史为鉴的原则，清醒地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共同反对侵略战争；读友好史，则是为了贯彻面向未来的精神，发现友好、播种友好、扩展友好，共同建设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对于认真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与教训来说，《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就有涵盖战争史与友好史两个方面的特殊学术价值和生命力。其实，这一目标也是王芸生先生想通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表达的历史见识与追求。

日本投降之际，王芸生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社评表示：“我们除了深恶痛绝日本军阀的严重错误及万恶罪行外，却从不鄙视日本人民……日本这民族是不平常的，只要放弃了穷兵黩武的思想，打开了狭隘骄矜的情抱，在民主世界的旷野上，日本民族是可以改造、可以复兴的。”1956年8月，王芸生先生在同日本的学术团体座谈时，又指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历史的产物，是“因为受‘九一八’事变严重国难的刺激而写的”，从这一点看，他是反对“历史糊涂主义”的；而他同时又提出：“而今事过境迁，似应忘掉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了”，因此主张“国无常仇”。可见，“明耻”和“教战”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根本的目的是实现国际和平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如果说1931年王芸生先生开始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就抱有这样的目的，那么今天编著《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就更应怀有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目标了。

如何将反对“历史糊涂主义”与主张“国无常仇”这两者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呢？刘大年先生曾专门就王芸生先生的“国无常仇”做过具体的论述，而在此，我也想就如何对待现实的中日关系谈一谈看法。

中国与日本是东亚世界两个重要的国家，古代中华文明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进步，近代中国也向日本学习了许多重要的文明发展成果。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中日两大民族友好交往，但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的半个多世纪里，军国主义日本则野蛮地侵略了中国，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深重灾难。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人类的正义得到了伸张，国家、民族遭受侵略、凌

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而“二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认识了战争的残酷与危害，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反省，日本政府也以反省和道歉的态度，表示理解和尊重受害国的民众感情。经过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长期不懈的努力，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重新确立了友好关系。从那以后的三十多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间往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发展，和平友好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重要利益，也促进了东亚地区和平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这一意义上，中日两国本着“国无常仇”精神放开眼界，瞻望长远的未来，确立建立在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之上的两国间正常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这种潮流将克服一切的支流或逆流，尽管有停滞，有迂回曲折，但终究要无可阻挡地发展下去。

但是，也不可否认，战后的日本仍然存在一股不肯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势力，而且这种势力对日本政治的影响有越来越强的倾向，从而导致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逐步凸现，在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有许多错误的态度和做法，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使中日关系出现复杂局面。这种情况往往使人们对是否存在“国无常仇”产生怀疑。其实，这里涉及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历史事实是不能修改的，它原来怎样就是怎样，决不是根据什么人的好恶而变换的。在这一层面，我们当然反对“历史糊涂主义”。但是也要看到，国际社会本身是不断发展前进的，仇与非仇的位置也会跟着变换。从各方面看，日本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重要近邻，利益交融，密不可分。中日两国人民往来频繁、交往密切是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的，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战争结束六十年后的今天，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战后出生的人们真正了解战争的历史事实，了解引起战争的原因和战争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对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与社会带来的灾难，则是更重要的问题。“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依然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实现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不承认世界上有永远的、绝对不变的事物。笼统地讲民族恶感，像日本的右翼势力一样鼓吹日本民族的优越，都不是科学的历史认识，而是在盲目鼓吹极端的民族主义，这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半个世纪前的1957年春天，王芸生先生为修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特地来近代史研究所找刘大年先生，从此与近代史研究所结缘。后来，大年先生为再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写了读后记。现在，在这部《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出版之际，编者又找到了近代史研究所索序于我，可见这件事与近代史研究所的渊源。然而，面对尊敬的王芸生、张蓬舟先生和大年先生等前辈，作为后学的我不敢侈谈作序，只能在此写下出版前的一些感想。我希望新出版的《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能够作为可资参照的历史资源，引导人们以冷静的心态和开阔的眼光，从多元的视野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中的历史与现状，认清中日两国各自的历史渊源和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与立场，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谋求有效的解决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步 平

2006年8月10日

序二

这部书原名叫做《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 1932—1982》，一个“近”字揭示了此书成稿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而它至今才得以完整面世，也表明其出版经历了本不该有的曲折过程。由原《大公报》老报人张篷舟（笔名杨纪，1904—1991）主编的这部书，以编年体形式翔实记录了长达五十年时间里“华北事变、八年抗战、日本投降、中日断交、复交、和平友好”等中日关系方面的重大史实。从 1982 年开始编纂，历时九年，到张先生谢世之际，近 300 万字的书稿大体完成。起初的情况还算顺利，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 1985 年至 1987 年间出版了前三卷（原书拟分九卷），其间还曾在香港举办的书展上获优秀图书奖。但后来则中途停顿下来了，据说主要还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然后到了 1992 年，也就是张篷舟先生去世的第二年，应是受到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的推动吧，又以较小印数出了四、五两卷。此后就续出无望、杳如黄鹤了。一晃十几年过去，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此书的多位编者已溘然辞世，健在人世的尚有周文熙（人民出版社退休编审）、袁海余（北京育英学校退休资深教师）二位，均已是八十开外的老者。纵然心又不甘，叵耐有心无力。因此，他们多年来早已对此书的重新完整出版不抱什么希望了。

说到这里暂且打住，我们不妨探究一下此书当年中途搁浅的背景和个中原因。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前期的中国，一方面从上到下都急切抓机遇、谋发展，强调“向前看”；另一方面各行各业或情愿或不情愿地都扑啦啦跳下水，海底淘金，“向钱看”。前者在贯彻中的偏颇，就是使人的注意力只向前而不向后，只向内而不向外，对历史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的关注相对冲淡；后者则直接导致对于传统的“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价值观的颠覆，经济效益与生存的关联之直接后果，就是赔本的买卖谁也不愿做。于是乎，我们这本“回头看”的记录既往中日关系的书，其市场和经济效益因不被看好而束之高阁，也就不足为怪了。出版机构也自有其遗憾和苦衷。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05年夏秋之交。旅居美国休斯敦的一些中国人偶然得知此书的坎坷遭遇，他们中的李庆元、申远方等人回国探亲时，遂找到袁海余老先生一问究竟，并看到已出的五卷书和未出的后四卷厚厚几大摞已经发黄变脆的手稿，洋洋大观，心血毕现。由是颇为震动，深为叹惋，顿生感奋，当即表示愿为此书重整面世而助一臂之力。于是就有了其后大休斯敦地区中国侨界社团丙戌春节联合义演，大陆、台湾、华裔等不同背景之华人为支持出版而齐捐善款的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而身为《大公报》老报人之后的张天润先生，则当仁不让地承揽了向国内联系出版的工作。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国内的朋友受托而积极联络，终由北京的文化艺术出版社承担了此书的出版任务。自此经春历夏，在该社编审向宏女士同周、袁二老（其间张篷舟先生之子张正则先生夫妇也给予了关怀和协助）及本人的合作努力下，经过重新修订完善的新五卷本《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新名），今天终于以全新的版本、崭新的面貌，全部完整地呈现在海内外读者面前，了却了已故和健在的前辈编著者的心愿，张篷舟先生及其已故同仁，谅可含笑于九泉了。

作为一位资深报人，张篷舟先生素以新闻编采为业，何以想起要在垂暮之年，主持编写这样一部以中日关系为题材的编年史书呢？这就不能不提及“一代报人”王芸生和他的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两部书可称得上是“姊妹篇”。

凡是了解中国报业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大公报》；而凡是知道《大公报》的人，都不会不知道王芸生。创办于1902年的《大公报》，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其“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在当时独树一帜。而长期充任该报总编辑和社论主笔的王芸生（1901—1980），则以其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地和睿智犀利的文笔，写出许多针砭时弊、为民请命的好文章，在新闻理念与实践方面也发表过不少颇具真知灼见的言论，至今耐人寻味，堪称宝贵财富。而王芸生贡献于世的文化财富，还有一个跨领域的荦荦大者，那就是创作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著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谓“六十年”，一如该书书名副题所示，是指由1871年“同治订约”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书约170万字，述而且作，叙议结合，条分缕析，敷衍铺陈，详解这六十年中间围绕

中日关系所发生的诸多事件，细剖蕴藏其后的复杂矛盾和错综缘由，持论公允，用据凿实，资料丰富，见解深刻，初在《大公报》专栏连载，1932年起连出单行本，至于七卷，受到中外朝野的普遍重视，日本即出过两种译本，至今仍为中外学界所看重、称道。抗战期间，蒋介石曾两次在庐山接见王芸生，向他请教中日关系的问题，还专门请他讲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一课。无独有偶，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准备期间，毛泽东也特意找来此书，深入了解中日关系史，并在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多次提到这本书。王芸生也由此而否极泰来，从“阶下囚”一跃而为“座上宾”，直接从劳动改造的“牛棚”坐进了人民大会堂里周恩来招待田中的国宴席，亲眼见证了他所主张的“国无常仇”的论断之成为现实。

话说当年，由于时局紧张等原因，“六十年”的最后十二年，即从1920年至1931年的部分，当时未及写出。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先生有意与时俱进，一方面对照唯物史观和主流观点修订原书思想内容，另一方面补足后十二年部分，以期重新出版。当时即请报社同仁张篷舟协助整理修订，历时多年，但因频受政治运动干扰，迟未如愿。“文革”结束，国逢中兴，王芸生先生又抖擞精神，不顾年迈多病，重邀张篷舟先生襄助，再修此书，一切走上正轨。可惜未及看到新版问世，于1980年病逝。次年，即1981年，原一至七卷新改本得由三联书店出版。而终于没能写出的后十二年部分，则由张篷舟先生按照王芸生先生生前委托，约请数位老友协助，在原有资料基础上校补增修，以“大事记”形式编为第八卷，亦于同年出版。自此，身为当年“八一三”抗战深入火线采写一系列轰动一时之新闻报道（后辑为《沪战实录》、《上海之战》出版）的历史见证者，张篷舟先生深感王芸老“以史为鉴”的有益工作需要延续下去，于是萌生续写其后五十年中日关系史的志愿。由于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又是沪战的亲历者和报道者，作为新闻工作者又收集了大量有关资料，特别是长期协助王芸生先生修订“六十年”一书，因而他有信心完成此事。乃于1982年起，约集周文熙、徐露放、袁海余等数位老友，精心编纂自1932年起至1982年止这一段极其复杂、极其重要的跨越五十年的中日关系编年史（其间参与资料整理和编校工作的还有祝立明、胡文德、张廷凯、汪德福、李国平等），目的是给时人和后人提供

一面全方位、广角度的清晰的历史镜鉴，以裨于人们清楚地了解历史，正确地认识历史，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清醒而端正地确定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好事多磨，张篷舟和王芸生的命运是如此相似，他们都是怀着庄严的使命感，而披肝沥胆，著书立说，又都是屡遭坎坷，壮志未酬而抱憾离去，而在身后又都得以将心血酿成的成果发扬光大，让后人感念他们的功德并从中受益匪浅。2005年7月，王芸生先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又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时隔一年，张篷舟先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又以《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的新名，而得以重新完整出版。这对于学界、出版界和广大关心中日关系问题的读者来说，都不啻是一桩盛事和喜事。其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一切曾为之出力的人，当然都有理由感到快慰。

本文在前面曾说到，“五十年”一书当初之遭遇搁浅，一定程度上与“向前看”和“向钱看”的社会价值取向有关。那么现在这两个“看”还在不在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对于长期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贫困包袱的中国人来说，这两个“看”被推广、被接受并非坏事。问题是我们瞻前莫忘顾后，见利不要忘义。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是可悲的，利欲熏心、浑浑噩噩的人群是可怕的。不幸的是，这两种“症候”都并非杞忧，而是到处可见的现实。但值得庆幸的是，就像社会深层次的改革虽然阻力重重但却大势不可阻挡一样，社会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人们立场和态度的选择的多元化，也日益以挡不住的活力，丰富着原本沉闷枯燥的社会环境氛围。近十多年来围绕中日关系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民间声音和行动，虽然来得晚了一些，声音也还弱一些、乱一些，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对历史记忆的尊重，对正义与公道的诉求，人权与民主意识的觉醒，民族自尊心的提升与回归。必须保护这种热情，而不是压抑和打击。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在围绕中日关系的国民态度上，存在着程度不小的认知肤浅和认识混乱，由盲目、糊涂而产生的麻木不仁和极端偏激同时存在。而国民态度是同引导和教育分不开的，似乎相关管理者对此还缺乏足够认识或缺少有效办法。多出点儿书吧！这是我们的呼吁。介绍过去，介绍今天，向日本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日本，交流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声音，传播面向未来的共识和愿景。

本文收笔正值“八一五”之际，传来日本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即将下台的小泉，执意以如此丑陋的形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谢幕。我们为一个大国的政坛要人如此置公义、“国益”于不顾而一意孤行感到吃惊，为日本朝野阻止不住右翼翻案逆流感到遗憾；为一个从战后废墟上站立起来、曾创造了空前经济奇迹的民族，却至今不能坦坦荡荡面对历史、认错悔过而感到悲哀。“知耻近乎勇”，这是中国古代贤哲的话，是中国人信奉的人格信条。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王芸生先生七十多年前面对民族危机，曾呼吁中国人要“明耻”。如今，这一呼吁对于中国人并没有过时；而对于某些陷入迷途的日本人来说，则更是醍醐灌顶、金玉良言。

本书编委、《建设者报》原副总编辑 李增春

2006年8月15日

目 录

CONTENTS

序一	1
序二	6
1932 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日本昭和七年）	1
附录一：驻沪十九路军将领通电抗日	
（1932 年 1 月 29 日）	55
附录二：日本政府关于上海事件的声明	
（1932 年 1 月 29 日）	55
附录三：植田谦吉致蔡廷锴最后通牒	
（1932 年 2 月 18 日）	57
附录四：蔡廷锴复植田谦吉函	
（1932 年 2 月 19 日）	58
附录五：上海市长吴铁城复上海日总领事村井仓松函	
（1932 年 2 月 19 日）	58
附录六：外交部长罗文干对外宣言	
（1932 年 2 月 20 日）	59
附录七：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	
（1932 年 3 月 12 日·日本政府公布）	60
附录八：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简称《淞沪停战协定》）	
（1932 年 5 月 5 日·外交部公布）	61
附录九：日满议定书	
（1932 年 9 月 15 日）	63
附录十：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日本承认“满洲国”致日本抗议书	
（1932 年 9 月 16 日）	64

附录十一：日本外务省关于承认满洲国之宣言 (1932年9月16日)	67
附录十二：国际联合会调查团对于中日问题报告书（节录） (简称《李顿报告书》) (1932年10月2日·外交部发表)	68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日本昭和八年）	96
附录一：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日军侵占山海关向日使提出照会 (1933年1月22日)	202
附录二：停战协定（塘沽协定） (1933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	203
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日本昭和九年）	205
附录一：日本反对国际援华	245
1. 日本外务省非正式声明（天羽声明） (1934年4月17日)	245
2. 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1934年4月19日）	246
3. 天羽英二答记者问（1934年4月20日）	247
4. 日外相广田弘毅谈话（节录）（1934年4月23日）	248
5. 日本政府声明（1934年4月24日）	248
6. 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第二次声明 (1934年4月26日)	248
7. 日外相对英、美大使质问提交答复纲要 (1934年4月26日)	249
附录二：国联中日事件顾问委员会决议邮件通过满境之三原则 (1934年5月17日)	250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日本昭和十年）	251
附录一：何梅协定（1935年6—7月）	355
1. 梅津美治郎致何应钦备忘录（1935年6月9日）	355
2. 何应钦复梅津美治郎函（1935年7月6日）	356
附录二：秦土协定（察哈尔协定） (1935年6月27日)	357